

从新见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看唐代东亚人员流动

拜 根兴

前 言

公元七八世纪，东亚大陆国家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并呈现集团性流动特点。隋炀帝的远征导致隋朝流星般消亡，人数众多的隋朝俘虏滞留高丽；东突厥战败，唐朝安置突厥人到长安周边居住；百济灭亡后数万百姓要么入唐，要么流向倭国；而高丽灭亡后则有数十万百姓到达唐朝内地，而前往倭国的亦大有人在。除过战争导致的人员流动之外，和平年代的商旅、使者、留学生、佛教僧侣求法巡礼、其他宗教来华传教等，亦是人员流动的重要途径。正是由于这种人员流动，加速了东亚各民族国家间的交流，调节弥合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地区间进步的失衡，促进了文化双向或多向传播。当然，最后定居唐朝的周边各族类百姓，逐渐成为唐人的一份子，为唐朝的繁荣做出他们的贡献。

入唐高丽遗民墓志研究，上世纪初学界就已有涉及⁽¹⁾，笔者近年来也有相应的论著出版⁽²⁾。2012年以后出土的高丽移民高牟、高提昔、南单德、李隐之、高乙德墓志，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³⁾。这些墓志现收藏于私家或公共博物馆之中。本稿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新见入唐高丽移民墓志未能涉及或者虽有涉及但仍有可资讨论者予以探讨！当然，涉及这一时期百济移民、新罗侨民，以及日本方面的“人员流动”问题，容随后再做具体探讨。

一、高提昔墓志铭

王其祚、周晓薇 2013 年公布了高丽移民高提昔墓志铭信息。具体来说，2012 年初在西安东郊龙首原上，出土了一方初唐高丽人墓志，这就是上元元年（674）《高提昔墓志》。墓志高、宽皆 38 厘米，志文 20 行，满行 19 字，楷书，有方界格。墓志盖呈覆斗形，志盖拓片高、宽皆 38 厘米，盖顶高、宽皆 27 厘米，盖题“大唐泉府君故夫人高氏墓志”12 字，4 行，行 3 字，阴文篆书，无界格。盖题四周及志盖四杀皆线刻卷草纹。墓志录文如下：

大唐右骁卫永宁府果毅都尉泉府君故夫人高氏墓志

夫人讳提昔，本国内城人也。原夫蝉冕摘华，叠清晖于往躅；潢漪湛态，挺芳烈于兰闾。

曾祖伏仁，大相、水镜城道使、辽东城大首领。祖支于，唐易州刺史、长岑县开国伯、上柱国。父文协，宣威将军、右卫高陵府长上折冲都尉、上柱国。往以贞观年中，天临问罪，祖乃归诚款塞，率旅宾庭。爰赏忠规，载班清级，因兹胤裔，族茂京都。夫人即长上折冲之元女也，德芬兰苑，声冠礼闱，博综情田，遵母仪之雅训；洞包灵府，宪女史之弘规。然而结聘泉门，才盈晦朔，未谐归展，俄事沦亡，惟其所生，悲摧玉掌。粤以咸亨五年六月四日卒于来庭里之私第，春秋廿有六。莫不璧沦朝彩，婺黯霄晖，风碎瑶柯，霜凋玉树。秦镜悲其鸾戢，孔匣咏其龙沉。遂使闾阎宿交，望素车而下泣；里閭亲好，辍朱紼以表哀。以上元元年八月廿五日窆于万年县浚川之原礼也。将恐秋阳递序，陵谷迁迥，所以图撰芳猷，树旌幽壤。其词曰：

弈叶崇构，蝉冕代晖。外谐懿范，内穆兰闱。如何景落，泉帐孤捷。幽扃永閤，寒陇凄凄。

王、周论文主要探讨了高提昔的祖父高支于，父亲高文协入唐时间，墓主高提昔的婚姻及其丈夫泉氏，高提昔的卒所及葬地，高提昔墓志所见官名地名考说，出土墓志所见入唐高丽移民高氏一族等五方面的问题。可以说，论文已全面涵盖墓志铭涉及的各个方面，如对高提昔祖父高支于和贞观十九年投诚唐朝的高丽萨褥高惠真的比对，墓志出现的高丽地名、官名如国内城、大相、水镜城、道使等的考述，以及对于高提昔其人 26 岁才出嫁泉氏原因的推论，均可见作者宽阔的视野和非凡老道的考释功力。也许是印刷或者校对的缘故，论文中引用罗末丽初著名留唐宾贡进士崔彦搆，也就是崔仁滚⁽⁴⁾之时，竟将崔仁滚误写为“崔仁流”，这是应特别指出的事情。

韩国学者金荣官也发表有关高提昔墓志的论文⁽⁵⁾。文中根据墓志文“天临问罪，祖乃归诚款塞，率旅宾庭”，证明高提昔的祖父高支于归降唐朝，应在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之时，又据当时战争进展情况，认为高支于投诚唐朝具体应在唐军辽东城、驻蹕山两次战役之间，此结论和上述王其伟论文所述相同。另外，金荣官认为高提昔的曾祖父高伏仁正好为唐太宗征伐辽东城时的辽东城大首领，并可能此时投诚唐朝。对此，笔者认为疑点太多，似乎并不能得出如此结论。作为高文协的长女，高提昔咸亨五年六月去世，即公元 674 年，时 26 岁，如此其出生时间当为公元 649 年。依据学界一般以 20 年为一代推算惯例，高提昔的父亲高文协生年应为 629 年，祖父高支于生年为 609 年，其曾祖高伏仁生年应在公元 589 年左右。高伏仁曾担当辽东城大首领，如果是 40 岁上下的话，其应在 629 年左右。至于高支于是否承继其父辽东城大首领职位，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个人曾经继承过父亲的职位，就推论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或者一定继承其父担当的职位，这是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金荣官还通过志文中“莫不璧沦朝彩，婺黯霄晖，风碎瑶柯，霜凋玉树。秦镜悲其鸾戢，孔匣咏其龙沉。遂使闾阎宿交，望素车而下泣；里閭亲好，辍朱紼以表哀”中的“秦镜”、“孔匣”等，得出“朝廷不知道高提昔的葬礼一事的惆怅之感，也有表达高提昔（家族）和婆家泉氏家族都是没有办法屈服于唐的意思”，以及“都包含着对皇帝暴政和昏聩的嘲弄以及对高丽的思念和热爱”。无论是泉男生、泉献诚父子迫于时势向唐投诚，还是泉男产、泉男建兄弟投降或被俘到达唐朝，这是当时唐与高丽关系发展的必然，泉氏兄弟接受频繁遣派出征边疆，虽然说是无奈的选择，但无疑也是心甘情愿的。至于生于唐、长于唐的高提昔，其祖、父投诚唐朝后担当唐朝地方中层官员，在开放包容的大背景下，和其他入唐民族一样，高提昔的童年生活状况理应不会太差，引文提到高支于父子入唐后，“爰赏忠规，载班清级，因兹胤裔，族茂京都”，就可说明问题。作为最早入唐高丽移民，高提昔和泉氏家族成员结婚，是否真正有什么对唐朝的不满和愤慨，似乎上引志文并不能

准确说明他们对唐朝的满腹愤恨和不共戴天。

从志文“然而结聘泉门，才盈晦朔，未谐归展，俄事沦亡，惟其所生，悲摧玉掌。粤以咸亨五年六月四日卒于来庭里之私第，春秋廿有六”看，高提昔长到26岁才出嫁，和泉氏结婚月余后就不幸夭折，故上引史料只是表达高提昔不幸夭亡，亲友乡间的惋惜沉痛之情，并非金先生所说的不屈服唐朝，嘲弄皇帝暴政和昏聩等。当然，第一代入唐高丽移民通婚对象多为同类的高丽移民，只能说明入唐高丽人融入唐人共同体还有待时日，等到第二、三代时，随着各种情况的改变，他们和唐人通婚就成为十分普通的事情了。

高提昔病亡于京师长安来庭里私第，这里位于长安城东北，是这一时期入唐高丽贵族军将们散居的主要区域。从志文上下文判断，来庭里应该是高提昔夫家的住所。

总之，高提昔墓志的出土，对于了解高丽入唐第一代移民的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特别是高提昔和泉氏家族人士结婚，显示出作为高丽第一家族的泉氏兄弟，他们入唐后家族婚姻趋向选择的无奈。

二、李隐之、高牟墓志

1. 李隐之墓志

李隐之墓志为最近新见的一方入唐高丽移民墓志。据楼正豪未刊论文所示⁽⁶⁾，墓志收藏于洛阳瀍河区马坡所在的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是此前学界未见提及的高丽移民墓志史料。志石长48.5 cm，宽53 cm，二十二行，正书，志盖篆书“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四杀饰鸳鸯及卷草纹。墓志文如下：

唐故赠泉州司马李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隐之，字大取，其先辽东人也，晋尚书令胤即其枝类。祖敬父直，或孝德动天，驰名于乐浪，或忠勤济物，誉表于扶余。公厌海隅之风，慕洛汭之化，重译纳贡，随牒受官，勇武既自于天然，果断宁由于学得。异夫子之入梦，且叹山颓，殊仙客之延龄，还嗟海变，呜呼哀哉！春秋五十有一，以大唐神龙元年正月廿五日寝瘵终于上林里之私第。朝野痛惜，亲故哀伤。帝皇悼怀，赠泉州司马以成送终之义。迁殡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之原。

夫人河间县君刘氏，贞节孤高，孀居荏苒，在家慕克己之德，训子从择邻之规。风树不停，隙驹难驻，琴亡鹤去，镜破鸾沉，呜呼哀哉！春秋八十有六，以大唐开元廿七年四月五日寝疾终于道政里之私第。粤以其年五月壬辰朔五日景申合葬于公之旧茔西南一里半，礼也。前临清洛，川声夜杂于松风，却背崇邱，岚气晓凝于薤露。嗣子初有，左领军卫翊府右郎将，仲子怀德，左骁卫翊府右郎将，季子怀敏，代州阳武镇将等。类高柴之泣血，哀慕充穷，若顾悌之绝浆，攀号崩迫。畏桑田之改易，虑高岸之沦移，旁求斯文，以作尔志。其词曰：

司马令德，来从异域，人之云亡，天子赠职，志不惑兮。夫人道终，合葬顺理，二龙次丧，两凤伦死，情难已兮。三子至孝，七日绝浆，思亲勒石，地久天长，不朽芳兮。

其实，李隐之的儿子李怀墓志已于1928年出土于洛阳北十六里南陈庄村，志石收藏于千唐志斋博物馆。笔者2002年发表的《中国所见韩国古代史关联金石文的现状与展望》文中曾提到李怀墓志，随后在2009年刊出的《唐高句丽遗民遗址遗物的现状及地理分布》论文⁽⁷⁾中也有专门探讨，故对于李怀墓志涉及的问题，不再赘言。

《李隐之墓志》载云，“其先辽东人也，晋尚书令胤即其枝类。祖敬，父直，或孝德动天，驰名于乐浪，或忠勤济物，誉表于扶余。公厌海隅之风，慕洛汭之化，重译纳贡，随牒受官，勇武既自于天然，果断宁由于学得”。

《李怀墓志》载曰：“昔晋氏乘乾，辽川尘起，帝欲亲伐，实要□□。公十二叶祖敏为河内太守，预其选也。克灭之后，遂留拓镇，俗赖其利，因为辽东人。至孙胤，举孝廉，仕至河南尹，加特进，迁尚书令，晋之崇也。曾祖敬，随襄平郡从事。太宗东幸海关，访晋尚书令李公之后，金曰：末孙孜在。帝许大用，尽室公行，爰至长安，未贵而没。悲夫！其子曰直，直生隐之，赠清源郡司马，公则清源府君之冢子也。”

楼正豪依据上引史料，以及《三国志》、《晋书》、《北史》、《新唐书》等史书，对李隐之、李怀先祖做了很好的考证，如此可列出李氏家族世系表：

李敏——李信——李胤——□□——□□——□□——□□——□□——李敬——李直——李隐之——李怀——李智通

李隐之的祖父李敬定居长安不久就别世，其父李直因此没有过多地享受入唐后家族的荣光。李隐之本人亦官位不显，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去世，享年51岁，其出生时间应为唐永徽六年（655），而其祖父李敬在唐太宗亲征高丽之后的645年到达长安，就是说，李隐之应该出生于长安或者洛阳，并成为入唐的第二代高丽化的汉人移民。即便如此，李隐之的结婚对象为河间县君刘氏，刘氏的汉人身份不容置疑，但是否同样是入唐高丽化的汉人则难能知晓。李怀天宝四载（746）病逝，享年68岁，可推算其出生时间为678年，作为长子的李怀出生于其父李隐之23岁之时。显然，入唐的高丽化汉人和纯粹高丽人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表现在婚姻对象的选取，对唐朝认同度的深厚与否，以及入唐后任官途径和性质上。

还有，楼正豪论文没有提及李隐之墓志出土地点。李隐之志文载其“大唐神龙元年正月廿五日寝瘵终于上林里之私第”，而其夫人刘氏“大唐开元廿七年四月五日寝疾终于道政里之私第”，李怀也是病终于“道政坊（里）”。就是说，李隐之、李怀家族可能先从上林里移住道政里，也可能拥有两处宅地。另外，李隐之先“迁殡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之原”，开元廿七年五月与妻子刘氏合葬，新墓距离“公之旧茔西南一里半”。李怀天宝四载四月二十二日与其妻王氏合葬于“洛阳县平乐乡之原，从周礼也”。也就是说，李隐之、李怀父子的坟墓应该在一个区域之内，这也符合唐人家族父子具有共同墓地的惯例。不过，如上所述，李怀墓志1928年出土，但并没有提及出土周边其他墓葬⁽⁸⁾，而李隐之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不详，其出土很可能和最近数十年的盗墓风潮有关，但其出土地点应该就在原出土李怀墓的周边地区。

无疑，李隐之、李怀父子作为入唐高丽化汉人后裔，他们的生活轨迹与纯粹入唐高丽人还有相当的区别，特别是墓志记载李怀在唐玄宗平定“韦氏之乱”建立奇功，使得李氏家族迎来入唐数十

年后又一次重要机遇，这不能不使人感叹“时势造英雄”的诡谲。

2. 高牟墓志

据高牟墓志拓片发现者楼正豪撰写论文所述，高牟墓志出土地点、时间不详，原石已不知去向，志文拓片仅存，现为洛阳私人收藏。墓志为正方形，边长 45.5 cm，四侧有线刻卷叶文。志文楷书，19 行，满行 19 之，共 282 字，有人、授、地、年月日载圣等武则天所造汉字，撰书者不详。

大周故左豹韬卫将军高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牟，字仇，安东人也。族茂辰韩，雄门誉偃，传芳秽陌，声高马邑。忠勇之操，侍楷矢之标奇；鞞师之能，跨沧波而逞骏。是以早资权略，夙禀枢机，候青律以输诚，依白囊而献款。授云麾将军，行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任隆韬禁，俯兰锜以申谋；位列爪牙，仰熏风而饮化。转冠军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既而痼瘵，旋及隙景，爰驰西山之药，不追北地之魂，永逝以去。延载元年腊月卅日薨于时邕之第。三韩流涕，十部分哀，悲缠东海之东，痛结外荒之外。以圣历二年八月四日窆于洛州合宫县界北邙山，之礼也。春秋五十有五。悲笳切迥，灵旌飘空，恐懿迹之遽沉，怆嘉名之不纪，式凭琬石，以表芳声。其词曰：

辰韩辽复，秽陌苍忙。怀忠效节，仰化归皇。趋驰武卫，出入鹰扬。荣分列棨，誉满遐方。将申茂绩，遂奄颓光。悲深阙水，恻切韩乡。小山落秀，大树沉芳。坟茔阒寂，松楸凄凉。庶斯铭之无泯，与悬象以恒彰。

高牟其人在现存文献史料中未见有记载，只是清人编撰的《全唐文》中收录的唐人判文中提到。楼正豪从高牟的出身及入唐背景，入唐活动两方面，探讨墓志铭涉及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对墓志文句读的诠释，堪称完备，为读者了解高牟生平事迹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笔者爬梳现存入唐高丽第一代移民墓志，排除战场殉国，被陷害冤屈而死，以及志文中未有表现者，其中提到墓主死亡后其子弟后人的哀悼及影响，似乎高牟墓志较为独特，不妨抄录予以对比：

《泉男生墓志》载云：“以仪凤四年正月廿九日遘疾，薨于安东府之官舍，春秋卅有六。震宸伤輶，台衡怨笛，四郡由之而罢市，九种因之以辍耕。”

《泉男产墓志》载曰：“邙山有阡，长没钟仪之恨；辽水无极，讵闻庄舄之吟。故国途遥，精车何日。鹤飞自远，令威之城郭永乖；马鬣空存，滕公之居室长掩。”

《高玄墓志》载云：“泉台杳杳，终无再见之期，蒿里[绵绵]，永绝□言之会。叹桑田之有革，惧陵谷之将移，勒石纪功”。

《高足酉墓志》载云：“驷马悲鸣，三军饮泣，春人辍相，工妇□□。”

《高提昔墓志》载曰：“秦镜悲其鸾戢，孔叵詠其龙沉。遂使闾阎宿交，望素车而下泣；里閭亲好，辍朱紼以表哀。”

《高牟墓志》载曰：“三韩流涕，十部分哀，悲缠东海之东，痛结外荒之外”。

高牟于武周延载元年（694）腊月卅日，死于神都洛阳时邕坊私第，此时的官职为“冠军将军，

行左豹韬卫大将军”，为正三品。虽则如此，志文中没有涉及他的死亡对于武周政权等的影响，而是直接提及“三韩”、“十部”、“东海”、“外荒”等高牟入唐前的故乡名讳。上引泉男生墓志虽提到“四郡”、“九种”，泉男产墓志文亦有“辽水”、“故国”字样，但像高牟墓志文中如此多的提到朝鲜半岛部族和地域，或许是在突出高牟的高丽移民身份的同时，强调他生前所领部伍可能有来自朝鲜半岛者。当然，高牟入唐后拜云麾将军，担当正四品下的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掌管“其府校尉、旅帅、翊卫之属以宿卫，而总其府事”⁽⁹⁾，后升职为正三品的左豹韬卫大将军，“职掌如左、右卫。其异者，大朝会则率其属被黑质鍪、甲、铠，执黑弓箭、黑刀、黑钲，建青麾、黑麾、黄龙负图旗、黄鹿旗、駉牙旗、苍乌旗，为左、右厢之仪仗，次立武卫之下。翊府翊卫、外府羽林番上者，则分配之。在正殿前，则以诸队立于阶下；在长乐、永安门内，则以挟门队列于两廊。凡分兵主守，则知皇城东、西面之助铺。”⁽¹⁰⁾。如果上述比定可以成立的话，是否可以推定唐朝乃至武周宫廷警卫部队，或者宫廷仪仗队中可能也有高丽军兵。如其不然，墓志文中提到高牟死亡后，三韩、十部等哀伤就无从谈起。

除此之外，高牟武周延载元年（694）去世，圣历二年（699）年埋葬，其间经过五年时间，同样，这在入唐高丽移民，特别是在唐担当重要职务者中是很少见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高牟尸身迟迟不能入土为安？是其影响不大？显然不是，担当正三品的左豹韬卫大将军，应该是显赫的人物；是酷吏政治所致？从最终的正面评价，以及酷吏们的消亡退场时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是其高丽人身份？好像也没有此方面的因素；抑或是其触犯了武周政权某种禁忌？等等，等等。因史料缺少的缘故，这些都难找到答案，故在此只能存疑。

三、高乙德墓志铭

据王连龙论文称，《高乙德墓志铭》见于互联网，葛继勇论文详细阐述获得拓片及研究过程，李成制、余昊奎论文则针对专门问题提出自己看法。不妨抄录墓志文如下：

周冠军大将军行左清道率府频阳折冲都尉高乙德墓志

讳德，卞国东部人也。昔火政龙兴炎灵，虜据三韩，兢霸四海。腾波白日，降精朱蒙。诞□大治燕土，正统辽阳。自天而下，因命为姓。公家氏族，即其后也。门传轩盖，经往代而联荣。宗继冠纓，历今辰而叠彩。祖岑，东部受建武太王中里小兄，执衎事，缘教责追衎事，降黜外官，转任经历数政，迁受辽府都督，即奉教追受对卢，官依旧执衎事，任评台之职。父孚，受宝藏王中里小兄，任南苏道史，迁陟大兄，任海谷府都督，又迁受太相，任司府大夫，承袭执衎事。公年纔立志，仕被邦官，受中里小兄，任贵端道史。

暨乎大唐龙朔元年，天皇大帝勅发义军，问罪辽左，公率兵敌战，遂被生擒。圣上舍其抗拒之愆，许以归降之礼。二年蒙授右卫蓝田府折冲长上。至总章元年，高丽失政东土，归命西朝，勅以公奉国尽忠，令检校本土东州长史。至咸亨五年，蒙授左清道率府频阳府折冲。至大周天授二年，加授冠军大将军，余并以旧。何期逝水不定，生涯有限。至圣历二年二月八日，遂于所任枕疾而终，春秋八十有二，权殡私第。至大足元年九月廿八日，发坟于杜陵之北合葬，礼也。烟云黯暧，原野苍茫。寒泉噎而含悲，风树吟而结叹。恩既不逮，悼亦何追。爰勒哀铭，式光殒谟。其词曰：

美哉器幹，盛矣徽猷。衣冠二域，令誉千秋。宗標圖史，代秀英謀。雄懷勝氣，志潔清流。其一。赴勞不憚，耿心唯恪。武蘊六韜，仁深一諾。吐言蘭蕙，傾心葵藿。生建龍旌，止題龍閣。其二。忽從朝露，長偃夜台。佳城郁郁，玄壤莓莓。林寒葉落，草暝霜皚。烟凝栢息，風結松哀。其三。寂夢神理，蕭條人事。春色靡同，年光是異。幽明永隔，顏容安值。式表殲良，鐫諸銘志。其四。

事实上，笔者去年12月在洛阳师范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上看到高乙德基志志石、志盖拓片，认定其出土于西安，并被盗运到洛阳，现收藏于洛阳私人藏家，并秘不示人^{〔11〕}。从现发表的四篇论文看，对于墓志文中个别文字的释读还有不同意见，但对于高乙德的族出、世系，以及墓志中对高丽末期地方、中央官制记载的史料价值认定却见解相同，对此笔者并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值得注意的是，高乙德是在龙朔元年（661）被唐军俘虏后入唐的。对此，墓志并未详细记载，王连龙推证其“应在龙朔元年九月契苾何力攻破鸭绿江之役，‘其时贼遂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尽降，男生仅以身免’，高乙德或在其中。根据墓志记载，高乙德虽被生擒，但受到礼遇，唐廷以归降之礼待之，龙朔二年蒙授右卫蓝田府折冲长上。”葛继勇没有具体论述，李成制有相似的论述。不管如何，高乙德和随后战争前后投诚唐朝的高丽军将还是有所区别，他是被唐军“生擒”，即就是在两军阵前浴血奋战，是力竭，还是中埋伏？但最终不屈而被生擒。从这一点看，高乙德在现存24方高丽人墓志墓主中确实堪称另类，当然，在当时状况下，像高乙德积极抵抗的高丽军将肯定还不少，只是因为史料欠缺，我们了解得少而已。不过，面对战败及不可回头的境况，高乙德还是选择归附唐朝的道路，并在总章元年唐与新罗联合灭亡高丽战斗中有所表现。

高乙德82岁高龄去世，这在已经获知的高丽移民中堪称高寿，远远超过此前指导的高足酉，以及百济移民陈法子。同时，高乙德“至圣历二年二月八日，遂于所任枕疾而终，春秋八十有二，权殡私第。至大足元年九月廿八日，发坟于杜陵之北合葬，礼也。”即其死亡两年半之后才葬于长安城南杜陵之北，而且是“合葬”！当然，这里的“合葬”一般来说是与死去的夫人合葬，而高乙德基志文中没有提到其他家人，如子息亲人等；龙朔元年到圣历二年（661-699），经过三十八年，可以推算出高乙德入唐时44岁，故国高丽灭亡也是八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他在唐朝很可能再婚，故他的夫人应该是一位唐人女子。还有，从圣历二年到大足元年，其间也经过两年，虽然高乙德权殡时间没有上述高牟时间长，但也是应该探讨的事情。期待有更多的石刻墓志史料面世，让学界了解这一时期东亚人员流动的更多细节，为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依据。

四、南单德基志铭

南单德基志2010年初出土于西安市东灞桥区红旗乡浐河东岸，墓志2012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依据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以及王菁、王其祎合著《平壤城南氏：入唐高丽移民新史料：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南单德基志〉》等文献论作，南单德基志志文作者为“中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薛夔撰”，书者、刻者未见。志文共24行，满行25字，楷书。志石高43.5 cm，宽44.2 cm，厚7.5 cm，无墓志盖。

大唐故饶阳郡王南公墓志铭并序

中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薛夔撰

夫人之在生，皆有定分。至于修短，互各等差。况行年八旬，足比上寿。故饶阳郡王讳单德，字单德，昔鲁大夫蒯之后，容之裔也。公生居平壤，长隶辽东。自随室已来，其国屡阻王命，累岁征伐。历至于唐，太宗愍戎，亲幸问罪，军师太震，瓦石俱焚。时夔曾祖行军大总管平阳公纁甲先駟，隳拔城邑，生擒其王莫丽支，斩首获俘，不可胜计。因此分隶辽东，子弟郡县散居。公之家，子弟首也，配住安东。祖狄，皇唐米州都督。父于，皇归州刺史。昆弟四人，单德元子也。

累在边鄙，忠勤日闻。开元初，上知素有艺能，兼闲武略，留内供奉射生。后属两蕃乱离，诏付夔祖汾阴公駟使，频立功郊，授折冲果毅，次至中郎将军。旋以禄山背恩，俶扰华夏，公在麾管，常怀本朝。复遇燕郊妖氛，再犯河洛，元首奔窜，公独领众归降。上念勋高，特锡茅土，封饶阳郡王，开府仪同三司、左金吾卫大将军，食邑三千户。每思报主，愿竭恳诚。于戏！上天不假永寿，以大历十一年三月廿七日寝疾，薨于永宁里私第，春秋七十有八。夫人兰陵萧氏。嗣子玠贡，正议大夫、试太常卿、兼顺州录事参军。夫人□女，长未初笄，居公之丧，哀毁过礼，闷擗初咽，绝浆七朝，耳目所闻，吁而洒泣。上佳忠义，赐之束帛，并给□部，葬加殊等。恩深霈泽，存歿光荣。以其年四月廿八日葬于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礼也。其词曰：

懿乎纯嘏，立操坚贞。少习流矢，攻战成名。其一

□心上荅，静难边陲。未□丹旻，二竖交驰。其二

□□孤坟，□对原野。魂散□□，千年永谢。其三

据上引南单德墓志，南单德唐大历十一年（776）三月廿七日死于京师长安永宁里私第，享年78岁。以年龄推算，南单德应出生于公元699年。按学界推算世代的一般惯例，如20岁算一代人的话，南单德应是高丽移民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大历十一年十月廿八日，也就是南单德死亡一个月后，被埋葬于唐京师“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万年县崇义乡位于今西安市东郊十里铺一带，从《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收集的墓志资料看，多处出现死者葬地为“万年县崇义乡南姚村”、“万年县崇义乡白鹿原”、“万年县崇义坊”等表述^{〔12〕}，而崇义乡南姚村为中唐时代著名藩镇何弘靖及其子孙墓地所在，上述诸多墓志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如南单德墓志提到“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字样还是第一次。就是说，南单德墓志给学界提供了唐代京师万年县崇义乡辖区的一个新的村名，为探讨唐长安、万年县基层行政组织提供了新的史料。

1. “子弟”与城傍子弟

关于子弟、城傍，以及城傍子弟，《陈子昂文集》卷10《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云：“营州士（土）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唯待官军”；《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载云：“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高丽移民《高玄墓志铭》载曰：永昌元年“奉敕差令诸州简高丽兵士，其年七月，又奉敕简洛州兵士，便充新平道左三军总管征行”。《南单德墓志》载：“时夔曾祖行军大总管平阳公纁甲先駟，隳拔國 國，生擒其王莫丽支，斩首获俘，不可胜计。因此分隶辽东，子弟郡县散居。公之家，子弟首也，配住安东。”

南单德志文两次提到“子弟”，其中后者有“公之家，子弟首也，配住安东”语句。对此，上述王菁、王其祎，楼正豪论文中均未做进一步诠释。其实，笔者认为这里的“子弟”应当是“城傍子弟”的简称。“子弟首也”，可解释为唐朝将南氏家族配置于安东都护府辖内，并赋予重任，也就是说，承担某个城傍兵民的管理任务。关于唐代城傍，此前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国内方积六、李锦绣⁽¹³⁾、王义康⁽¹⁴⁾等学者均有论文发表，特别是李锦绣先生的论述颇为全面深入。同时，上述学者虽对一些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城傍作为唐朝安置入唐边疆民族的措施，城傍子弟作为一种蕃兵组织，他们的看法却是较为一致的。依据上引《唐六典》、《高玄墓志铭》，唐朝乃至武周政权对于分散各地的高丽等蕃族兵士，有定期点检制度，每年两次练兵，以备边疆不时之需⁽¹⁵⁾。特别提到各个州县城傍子弟，秋天农闲时集中练兵，到春天则放散从事农耕生产。墓志作者在唐秘书省著作局任职，对七世纪中叶高丽及其他民族人士入唐，唐朝在东北等地的安置措施的了解必然清楚，加之他本人和南单德家族固有的关系，故而用“子弟”称呼南单德先祖，显示出当时“城傍”安置高丽等民族入唐人士的措置手段，以及“城傍子弟”普遍存在的史实。

南单德家族在高丽灭亡之后，作为城傍子弟被唐朝分散安置，并作为城傍子弟首领，居住于安东辖下城傍。不仅如此，当时在收复的辽东高丽旧地，城傍成为安置归附的高丽军兵百姓的主要行政单元，和唐朝的郡县组织富有同样的职能，并在此后的岁月里，起到了为唐朝乃至武周王朝捍御东北边疆的作用。唐玄宗时代的重要大将王思礼，即“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牙”⁽¹⁶⁾。南单德的祖父南狄、父亲南于两代，应该是先被安置于安东都护府辖下城傍，并担任一定的职务，后任职于安东都护府管辖的磨米州、归州两地，为唐朝东北边疆的安宁建立功勋。

2. 南狄担当磨米州都督

南单德的祖父南狄曾担当磨米州都督之职，从志文“皇唐”，以及依南单德年龄推算其祖父的年龄看，南狄担当磨米州都督的时间，应该在唐与武周政权轮替之后。就是说，若上述推论南单德的祖父南狄出生于659年左右没有疑问的话，高丽灭亡时其年仅十余岁，应该是随其父亲被安置于安东城傍，等到其七世纪中后期担任唐朝磨米州都督，应该是二三十年后的事情了。有关辽东磨米城，史书记载并不相同。笔者曾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的记载，认为磨米州为安东都护府辖下的十四州府之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磨米州治所所在逐渐形成行政军事中心，磨米城由此出现。南狄担任磨米州都督，应该就在武周政权收复磨米城之后。至于磨米城的位置，笔者在此前的论文中亦有所考察，即认同王绵厚先生的观点，“今从新、旧唐书记载看，本溪县下堡山城更符合其地望”⁽¹⁷⁾。另外，作为高丽移民的高性文、高慈父子，曾在武周时期率领当地军民，坚守磨米城，奋力抵抗契丹叛军的进攻，磨米城战斗中高性文、高慈父子壮烈牺牲。现存《高性文墓志铭》记载了磨米城战斗的惨烈和高氏父子的英勇顽强。云：“众寡力殊，安危势倍。城孤地绝，兵尽矢穷。日夜攻围，卒从陷没。为虏所执，词色懔然。不屈凶威，遂被杀害”；墓志铭还转述武则天诏敕云：“高性文既能脱衣，招携远藩，宜内出衣一副，并赐物一百段。又，性文下高丽妇女三人，固守城隍，与贼苦战，各赐衣服一具，并资物卅段”⁽¹⁸⁾。磨米城战斗发生于公元697年，武周军队和当地军民几乎全军覆没。至于南狄担任磨米州都督的具体时间，因没有史料说明，难以定论。但从南狄的年龄和当时情况分析，南狄担当磨米州都督的时间可能在此之后。

3. 唐朝开放包容与民族融合

《南单德墓志铭》的作者为薛夔，依据王菁、王其祎的研究，薛夔为唐初著名将领薛仁贵的后裔，薛仁贵直接参与 645 年唐太宗亲征高丽战斗，并且屡建奇功。此后他奉诏多次出征朝鲜半岛，并在灭亡高丽战斗中表现突出，此后又参与指挥征伐新罗的战役，成为七世纪中叶唐朝名实相副的战将之一。墓志铭文亦明确记载薛夔时任“中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并指出“时夔曾祖行军大总管平阳公擐甲先驱，隳拔城邑，生擒其王莫丽支，斩首获俘，不可胜计”。而南单德的先祖正好是在这次战斗之后从平壤迁居辽东一带。问题是南单德撰写墓志的任务竟然由薛仁贵的后孙承担，这使人不得不叹服天地造化的奇特。为什么如此？墓志记载南单德本人先在京师长安作“内供奉射生”，随后在薛夔的爷爷汾阴公薛某⁽¹⁹⁾麾下为官，官至中郎将。安史之乱爆发后，南单德被裹挟参与叛乱，但“公在麾管，常怀本朝”，故最终“领众归降”，如此才被唐廷封为饶阳郡王、开府仪同三司、右金吾卫大将军、食邑三千户。对此，楼正豪以“两蕃乱离”、“燕郊妖氛”两节予以解释，颇为详备，故不再赘言。因为南单德与薛夔家族的渊源关系，虽然南单德可能年长薛夔很多，但两人应该很早就认识，薛夔对于南氏家族入唐后繁衍任官情况也十分了解；再加之薛夔在秘书省著作局担任佐郎，故撰写正三品级别官员南单德墓志铭的任务就落到他的头上。

另外，南单德娶兰陵萧氏为妻，著籍长安并最终安葬于此，正如王菁、王其祎所言：南单德墓志的出土“为研讨入唐高丽移民的归属意识与民族认同问题，以及渐趋融入唐人共同体的历程又增添了一例新史料，并进而为站在以中国为核心视域的角度探索中国古代王朝与周边关系的‘朝贡体制’问题下的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提供了一例典型个案。”就是说，中唐以后，作为高丽移民的主体意识已不复存在，其出自只是表示其先祖的来源所在，并和其他入唐民族，如突厥、回纥等民族人士一样，南单德家族与其他唐人一样，生活在同一地域、具有共同心理希求，成为唐人共同体的一份子。

与南单德相同经历的高丽移民后裔，现在可以看到的还有泉毖、高德、高钦德、高远望、高震、高震女儿，以及文献史料中出现的王毛仲、高仙芝、王思礼、李正己等人。这些人的墓志铭或相关文献史料均表明其出自朝鲜半岛的事实，但因为已经是移民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的缘故，其生活区域除过个别人之外，一般均在唐朝两京及其周边地区；其中担当唐朝武者居多；结婚对象大多为唐朝汉人或入唐其他民族女子，很少见到与本民族女子结婚的例子。也就是说，入唐高丽移民后裔到第三代以后，原来生活于辽东地域者，其后裔大多移入两京地区，进而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其生活习俗、家庭构成、行为规范，几乎和唐人没有更多的差别，显示出当时民族融合发展的空前景象。

至于墓志中涉及中古中原南氏迁变历程，以及家族如何为躲避战乱迁徙辽东平壤，唐代出现的南氏人物是否还有与入唐高丽移民身份的南单德家族相似的经历，上述王菁、王其祎论文中已有所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结 语

本稿在中韩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新公布的五方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研究中未能涉及的问题做了新的诠释。由于七世纪中叶唐与朝鲜半岛政权错综复杂的交往，双方人员流动异常频繁，这里提到五方东来的高丽人墓志，而众多的唐人军将前往朝鲜半岛，有的人不幸殒命异乡，而另外一些人侥幸返回，这种由于双方的战和关系，人员被动的流动的方式，显示出这一时期东亚大动荡、大组合的现实。而八世纪之后东亚人员流动则更富主动性和可操作性，体现出唐朝开放包容政策也普惠东亚其他地区，推动东亚各国律令制度建设，人员流动的经济文化价值也得以体现。高丽移民后裔南德墓志，显示出经过岁月的洗刷，和其他入唐民族一样，高丽移民后裔已经融入唐人之中，成为唐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事实。感谢王其祗、周晓薇、王菁、金荣官、楼正豪、王连龙等先生，是他们率先探讨这些新出史料，提出宝贵的见解，进而启发笔者在此基础上作补充研究，他们的开山之功不可磨灭。可以预见，洛阳、西安两地新的入唐高丽移民墓志可能还会陆续出土面世，相信随着新的史料的不断出现，学者们的潜心探索，有关入唐高丽移民问题的研究一定会更加深入，这一时期东亚人员流动关联问题的探讨会更加明朗化。

註

- (1) 日本学界上世纪初就有内藤湖南等人发表文章，中国学界自1937年罗振玉编撰《唐代海东藩阀志存》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逐渐增多，但以此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很少。韩国学界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先有李丙焄、卢泰墩等学者振臂一呼，后有李道学、李文基、郑炳俊等接踵响应，近年来金贤淑、金荣官、权惠永、安正俊等人为探寻新出土墓志中的朝鲜半岛原住民资料，频繁往来于中韩之间，发表有多篇探讨高丽、百济移民关联论文，代表了韩国学界研究这一时期东亚“人员流动”的最高水准。
- (2) 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拜根兴《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 (3) 高牟墓志见楼正豪：《新见唐高句丽遗民〈高牟墓志铭〉考释》，《唐史论丛》总第18辑，2014年；高提昔墓志见王其祗、周晓薇：《国内城高氏：最早入唐的高句丽移民——新发现唐上元元年〈泉府君夫人高提昔墓志〉释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54—64页；金荣官：《高句丽遗民高提昔墓志铭研究》，《碑林集刊》总第19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南单德墓志见楼正豪：《新见唐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考释》，载《西部考古》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王菁、王其祗：《平壤城南氏：入唐高句丽移民新史料——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南单德墓志〉》，《北方论丛》2015年第1期。李隐之墓志见楼正豪：《唐高句丽移民李隐之、李怀父子墓志铭考释》，《韩国古代史探究》第21辑，2015年。高乙德墓志见王连龙《高句丽遗民高乙德墓志考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葛继勇《高句丽遗民高乙德墓志探讨》，《韩国古代史研究》第79辑，2015年；（韩）余昊奎《通过高乙德墓志铭看高句丽末期的中裹制和中央官制》，（韩）《百济文化》第54辑，2016年。
- (4) 参拜根兴：《崔彦撝与罗末丽初僧侣塔碑撰述：兼论求法巡礼僧侣的往返线路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 (5) （韩）金荣官：《高句丽遗民高提昔墓志铭研究》，《碑林集刊》总第19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
- (6) 楼正豪：《唐高句丽移民李隐之、李怀父子墓志铭考释》，《韩国古代史探究》第21辑，2015年。

- (7) 前者刊于韩国《新罗文化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韩国庆州，2002年；后者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
- (8) 郭培育、郭培智主编：《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77页。
- (9)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24《诸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23-624页。
- (10)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24《诸卫》，第621页。
- (11) 从《祔寔进墓志》《武承嗣墓志》，到《高乙德墓志》，其均为盗掘出土于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后被盗运到洛阳，为洛阳私家收藏。似乎西安洛阳间存在一个地下文物盗运链条，其是否集盗掘、盗运、收藏、转卖一条龙黑链条无从知晓，但此应当引起西安公安局的注意，进而斩断这条异地文物盗掘盗运盗卖的黑手。
- (12) 笔者查阅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录出死后葬于万年县崇义乡者共十八人，其中八人葬地在万年县崇义乡南姚村，还有崇义乡白鹿原、崇义乡之原、崇义乡口水东原等，而明确题名“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者则仅此一例。
- (13) 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学人》第8辑，1995年。
- (14) 王义康：《唐代城傍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 (15) 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16) 《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
- (17) 参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20-221页。
- (18) 吴钢等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 (19) 楼正豪认为这里的“汾阴公”有可能是薛讷或者薛楚玉。见上引楼正豪的论文。